

# 将《文艺报》送回家

□束沛德

《文艺报》是我文学与人生之旅中真挚、贴心的旅伴。我们手拉手,心连心,一起走过了70个春秋。

5年前,我写过一篇《与我一路相伴的〈文艺报〉》,记述了我与《文艺报》难解难分的情缘。即将迎来《文艺报》70华诞之际,我想从读者、作者、编者三个层面简略地说一说它与我之间的情谊。

我是《文艺报》的一个忠实读者。跨入大学门槛不久,恰逢《文艺报》诞生。尽管囊中羞涩,我还是咬咬牙,从有限的零花钱中挤出一点钱订阅了《文艺报》。从那时到今天,《文艺报》始终伴随着我。随着工作的调动,从北京到天津,从天津到保定、石家庄,再回到北京,不知多少次搬迁,不少书刊我都忍痛割爱了,唯独一份《文艺报》一直紧随在身,舍不得丢弃。

我也是《文艺报》的一个比较积极的作者。上世纪50年代,我在《文艺报》发过两篇多少有点影响的儿童文学评论,其中《情趣从何而来》一文,至今被论者和文友看作我的“代表作”、“充满创见”、“卓尔不群”的作家品评论。正因为这两篇文章,在80年代中国作协书记处分工时,让我联系儿童文学界,从而有机会经常与《文艺报》“儿童文学评论”栏目打交道,在这个平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粗略算来,先后在《文艺报》发表的长短不等的评论文章可能有四五十篇。加上散文随笔,也许就不止70篇了。近两个月,我就在《文艺报》接连发了《七十年儿童小说花团锦簇》《七十年童话创作多姿多彩》,以及评介李东华《焰火》的书评,还有一篇往事纪实《1953年中国文坛一大盛事》。如此密集地频频亮相,对一个耄耋老人来说,该算是积极的了吧。

我还是一个与《文艺报》擦肩而过、未能如愿上岗的编辑。我是学新闻的,又爱好文学,《文艺报》可说是我心驰神往的一个工作岗位。1978年作协恢复工作,我回到文学队伍。时任作协负责人、也是《文艺报》主编的冯牧让我到编辑部读作品、拟选题、组织文章,自己也

动手写。应当说这是一个符合我的兴趣、愿望,也是可以发挥我的潜能的一个岗位。可是由于作协另一位负责人李季执意让我到作协新成立的创作联络部,无奈我还是错失了这次去《文艺报》的机会。在我心目中,《文艺报》是个锻炼人、培养人、出人才的地方。这辈子无缘到《文艺报》当个编辑,我至今还引以为憾哩!

我没想到《文艺报》编辑部没有一套从创刊至今的完整的《文艺报》,这些年来,编辑部曾不止一次地从我处借用某年某月的报纸。在它的70岁生日前夜,我决心把自己保存、收藏的一套完整的《文艺报》(1949—2019)悉数捐赠给编辑部。当我把分散在房间犄角旮旯的这些报纸集中到一起,面对它们,真还有一缕难舍难分的感情。但我更为它们终于回了家,有了最好的归宿而欣慰。

伴随新中国70华诞的同时,《文艺报》也迎来了70岁的生日,我们没有亲历这份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文艺类报纸的创建,但目睹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文艺报》的传播,感受到它给读者带来的欣赏和激励。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与《文艺报》“少数民族文艺专刊”多有联系,常常感怀这块园地上的春华秋实。

2006年秋,记得最初拟创办“少数民族文艺专刊”时,时任《文艺报》总编室主任的王山对我说,新时期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蓬勃发展,文艺报社的领导经过研究,准备加强少数民族版面,让他负责专版,他特为征求一下各方面的意见。我们坐在一个小饭店里,听完他的话我十分高兴,这个专版显然是少数民族文学园地的又一拓展,刊登的散文、诗歌、评论各类作品可更加贴近生活、短小精悍;可加强对精品力作的评介,对文学新秀和人口较少民族作品的推荐等。王山谦逊地点头称是,并约我为这个专刊写稿。没过多久,第一期“少数民族文艺专刊”面世,以其多民族的文化信息、风格独特的面貌让读者耳目一新。

此后,我陆续应约写了一些小文章,专刊为此开辟了一个“主编第一视野”专栏,后为“新视野”。我最初介绍了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青年作家群体,继而又接连介绍了多位少数民族作家及作品。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历史悠久、变化巨大,色彩丰富,有着深厚的文学土壤,生活在那里的少数民族作家常以他们的作品见证民族的变迁,表达对自然的敬畏保护,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梦想追求,如同七彩之光,斑斓多姿。蒙古族诗人阿尔泰和他的诗集《阿尔泰蒙古古风》,围绕着祖国、民族、人民和草原,在充满激情的抒怀和深沉的哲理思考中唱出了时代的呼声、民族的心声,是我国当代蒙古族母语诗歌创作的标志性著作。《民族文学》自2009年创办了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版之后,许多用母语创作的作家诗人都十分欣喜,认为这是国家对不同民族的母语更为实际的一种关爱。那年我们为此分别赴内蒙古、西藏、新疆召开了翻译家作家的座谈会,曾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集《草叶集》翻译成蒙古文的阿尔泰也一起走进了拉萨,与藏族的作家翻译家倾心交流,用他马头琴般的音色,用他深爱的母语读他的诗:“露珠醒了,奔向灿烂的朝阳/激情醒了,投入火热的生活/醒来吧,我的诗。”我们这些不懂蒙古语的人在一旁听着,也情不自禁地被那种难以形容的魅力所感动。

生活在苍茫的青藏高原上,内心充满敬畏的藏族作家次仁罗布,他的作品剖析族人隐密的心灵,从多种不同的角度表现出藏族人民在时代的动荡中所受到的冲击,表达出作家包容的情怀、善良的呼唤。维吾尔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精通母语和汉语,他的长篇小说《时间悄悄的嘴脸》(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讲述了一个恶惩扬善、自我救赎的寓言式故事,充满维吾尔文化的幽默深邃、哲理和诗性。善于开掘生活、刻画人物的仡佬族作家肖勤,从女乡长到县长,一直工作在第一线,同时用写作表达着对家乡土地和生活的一片真情。她的成功给更多的文学人以证实,生活才是创作的源泉。经历过汶川地震的羌族诗人羊子从撕心裂肺的生死边缘走过之后,重新审视那片古老的土地和民族,在他的组诗《汶川之歌》被《民族文学》特别推荐之后,又捧出了长诗《汶川羌》。

从大漠绿洲的北疆、草原冰封的雪域,到云深林茂的丛岭、稻香叠翠的南国,在中国辽阔的山河大地上,56个民族的作家诗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所讲述的故事精彩纷呈,数不胜数。《文艺报》“少数民族文艺专刊”让许多不忘初心、讴歌祖国与时代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进一步走入广大读者的视野,共同妆点当代文学的多姿多彩,也让无数少数民族文学新秀崭露头角。十几年来,我前后为专刊书写了数十篇文章,就如同一次次穿过多样化的河流,领略不同的风景和生活,倾听那万千气象中蕴含的声音,让我常怀感慨之心。“少数民族文艺专刊”的编辑明江、黄尚恩等多年来勤勉敬业,四处组稿,精心编校,在与他们交往的数年间深感其辛苦不易。《文艺报》创办以来,跨过新世纪,走入新时代,坚持导向、凝聚气魄,伴随祖国的脉动和文化的兴盛,共同迎来70年庆典,春华秋实,可喜可贺。

文学报刊的热情依然不减。1987年1月19日,我正为硕士毕业论文写作茶饭不思,突然收到了汤锐女士的来信,是一封诚恳殷切的手写约稿信。当天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收到汤锐从中少社发来的信,说‘文艺报今年新辟儿童文学理论版,你如有佳作望及时寄给我’。”对于正在暗暗思虑如何在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小试身手的年轻人来说,《文艺报》上这个版面的开辟,该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啊。而我与《文艺报》的缘分,也就这样拉近了。

几天后,我从已经改版为报纸出刊的《文艺报》上看到了“儿童文学评论”版的第一期。这一期《文艺报》是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专刊,内容丰富、有趣、厚重,混杂着沧桑、喜气和庄严感。隐约记得封面右上方“文艺报”几个字是深绿色的,内文图文并茂。与会作家的大量照片与文字信息形成了宝贵的补充。印象最深的两幅照片,一幅是中青年女作家茹志鹃、张洁、叶文玲、刘真簇拥着老作家冰心先生的合影,发自内心的喜悦极有感染力。另一幅是一位香港作家与翻译家、学者戈宝权等的合影。时值初冬,戈先生穿着厚厚的冬衣,来自南国的香港作家却身着短衫短裤,令人过目难忘。

1982年初大学毕业分配去了一所小镇中学做语文老师。两个月后,我的专业兴趣从文学、美学转向了儿童文学,阅读各种

春华秋实

□叶梅



“新作品”杨绛题,“原上草”臧克家题,“世界文坛”钱锺书题,“星河”王蒙题,“儿童文学评论”冰心题,“团结湖”莫言题

## 我是《文艺报》的朋友

□刘文飞

我敢于自诩为《文艺报》的朋友,当然是因为自己跟这份报纸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为这份报纸撰稿,我今已发小文数十篇,是长期得到《文艺报》关照的一位作者。在我成为中国作协会员之后,这十几年来一直获得《文艺报》赠报,我几乎每期必看,是《文艺报》最忠实的读者之一。

我与《文艺报》的朋友关系,首先体现为与该报“世界文坛”的版亲近。记得1993年夏天,当时在社科院外文所遇见该栏目编辑李维永女士,她知道我刚刚去过一趟莫斯科,便问有没有什么文艺现象可以介绍,我告诉她:苏联解体前后的莫斯科天翻地覆,似乎一夜之间什么都变了,但作为特殊艺术符号的维索茨基却风头依旧,街头售货亭里仍旧满是他的录音盒带,书店里也仍旧摆着他的唱片、诗集和画册,这似乎象征着政治巨变背景下艺术的恒久价值。她闻之显得很兴奋,约我写一篇文章,我便写出了《时代呼唤它的艺术代言人——维索茨基现象的思考》一文。我的文章由“维索茨基之路”“维索茨基之谜”和“索茨基之启示”3个小节构成,介绍了维索茨基集演员、歌手、诗人等为一身的艺术角色,维索茨基在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社会享有的巨大声誉和影响,对“维索茨基现象”的本质进行了阐释,并呼唤中国的维索茨基的诞生。

没想到,这样一篇小文还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黄宗江先生看到此文后打电话到我所在的工作单

位社科院外文所,与办公室人员约定了时间,在我上班的时候他再打来电话,记得我们聊了很久,他详细了解了维索茨基的情况,并发出一阵由衷的感慨;又过了几天,我在外文所的老师辈

同事童道明先生在上班时告诉我,于是之先生也读了此文,称是好文,并请童老师转达对他此文作者的谢意。一篇小文章居然引起了于是之和黄宗江这样的大艺术家的关注,这让我在窃喜之余也感受到了《文艺报》在中国文艺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

李维永女士退休后,我和《文艺报》“世界文坛”的关系却持续了下来。俄国文坛的新情况、俄国作家的来访和中国作家的访俄、俄国文学在中国的最新传播,以及俄国文学的译介体会等等,每每成为我和编辑王杨的交谈话题,后来也往往会成为刊发在《文艺报》上的一篇篇文章。最值得一提的是,在编辑的督促下,我于2017年1月起在《文艺报》上开辟了“西山晨语”专栏,每月一篇,陆续发表了《我们的“文学自信”》《再读普希金》《祖列依哈的世界》《两家(十月)的握手》《俄语文学的性别变迁》《狂野俄罗斯》《二十一世纪的俄国长篇小说》《一位作家之于一座城市》《力冈文学翻译的历史意义》等十余篇短文,虽然当时写得很苦,每月临近交稿的时间都会惴惴不安,但到底年底,回过头去看那十余篇文章,心头还是有一种满足感的。我把这些文章集中起来,再加上自己陆续写的其他散文和随笔,拟以《西山晨语》为书名出版一本小集子。

我是《文艺报》的读者,是《文艺报》的作者,也是《文艺报》的朋友,是《文艺报》“世界文坛”版的朋友。更为重要的是,我通过《文艺报》结交到了更多的朋友,他们或为《文艺报》的编辑和记者,或为《文艺报》的其他作者和读者。我因拥有《文艺报》这样一位能给我巨大帮助和不断鞭策的良师益友而自豪!

## 相伴四十年

□方卫平

1977年初夏,高中毕业前夕,我与几位好友同学鬼鬼祟祟讨论的话题是,去哪里插队落户。不久以后传来消息,高考恢复了。我们10月份开始准备考试,11月份稀里糊涂参加初试,12月份杀进复试考场。转过年来,我收到了一份入学通知书。

作为应届高中毕业生,我的中小学时代在“文革”时期度过。成为中文系本科生的时候,我从未听说过巴金的名字,也不知道沈雁冰就是茅盾。除了看过几期“文革”时期的《工农兵画报》之外,从未接触过任何文学期刊。幸运的是,我们很快赶上了新时期文学最初的那些令人亢奋的日子。入学不久,从春天到夏天,《哥德巴赫猜想》《于无声处》《伤痕》等作品所引起的一阵又一阵文学骚动,让我们进入大学后的每一个日子都充满激情和幸福,思想解放的进程和文学生活的恢复与重建,轻而易举地把我们初入大学的生活变得闪闪发光。记得1978年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奖,采取群众、文艺团体、文学出版机构推荐和专家评定相结合的评奖方式,我们小组的几位同学群情激昂,唇枪舌剑,集体推荐了30篇作品。待到评奖结果揭晓,大家对照28篇获奖小说名单,发现竟有17篇作品在我们的推荐篇目中。虽然我们知道这只是无名的普通投票“群众”,但大家恍若都中了“参与奖”一般欣喜无比。

我那时候年纪小,入学时16岁,在一群老大哥大姐面前最显无知和幼稚。不过,生性比较内向,也容易给人造成错觉,用给我们上英语课的张先昂老师的说法,“方卫

平少年老成”。除了与同学们一起阅读、讨论文学新作这类“公共生活”之外,我还懵懵懂懂地私下一“研读”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小逻辑》等哲学美学著作,悄悄而激动地关注、搜索文学期刊复刊、创刊的消息。从1978年开始,《文学评论》《文艺报》《文艺研究》《读书》《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的复刊、创刊等,是我非常关注的文学动向。1978年夏天复刊的《文艺报》,就是在图书馆报刊阅览室看到的。除了每周至少两次去图书馆的阅览室翻阅各种报刊外,我也试图从牙缝里挤出微薄的生活费订阅刊物。1979年11月1日在我的日记中写到:“八零年度报刊杂志开始收订,想订《文学评论》,但是不扩大订户,只能眼巴巴被关在门外。《文艺报》可订。还有《文艺研究》(双月刊),惜不能直接订阅,而要向北京编辑部联系。下午写了封信准备寄去。《文学评论》准备托施群在上海零卖。”日记里提到的施群是与我同年考上大学的一位高中同学。

那一年最终并没有订上《文艺报》,是订购技术原因或终因囊中羞涩而放弃,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那封寄给《文艺研究》编辑

部的信,因为地址不详被退了回来。

就在我写上述日记的两天前,在10月30日的日记里,我记下了这样一句:“文艺工作者四次代表大会在京开幕。”熟悉当代文学发展史的人都知道,那是在新时期文学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12月23日的日记里写道:“在市区买到《文艺报》第11、12期合订本和朱德生、李真主编的《简明欧洲哲学史》。”

所谓的“合订本”其实是合刊。这一期《文艺报》是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专刊,内容丰富、有趣、厚重,混杂着沧桑、喜气和庄严感。隐约记得封面右上方“文艺报”几个字是深绿色的,内文图文并茂。与会作家的大量照片与文字信息形成了宝贵的补充。印象最深的两幅照片,一幅是中青年女作家茹志鹃、张洁、叶文玲、刘真簇拥着老作家冰心先生的合影,发自内心的喜悦极有感染力。另一幅是一位香港作家与翻译家、学者戈宝权等的合影。时值初冬,戈先生穿着厚厚的冬衣,来自南国的香港作家却身着短衫短裤,令人过目难忘。

1982年初大学毕业后分配去了一所小镇中学做语文老师。两个月后,我的专业兴趣从文学、美学转向了儿童文学,阅读各种